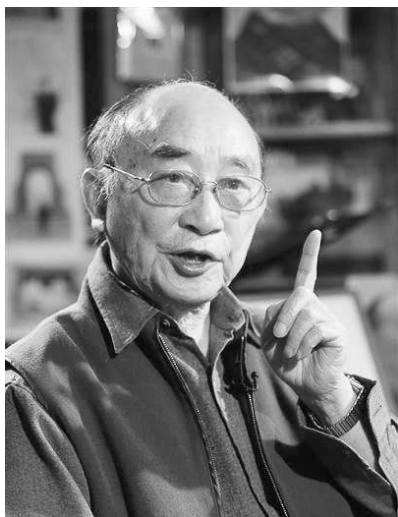


# 回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先生

林阳



▲贺友直

美术出版社；两社基本上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主要产品。北京的连环画画家主要有徐燕孙、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卜孝怀等；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画家钱笑呆、赵宏本、顾炳鑫等人。

贺友直学历不高，但他虚心求教，积极地向前辈和一些成名的画家学习。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坚持到明天》《火车上的战斗》《六千里寻母》《卓娅和舒拉》《连升三级》《孙中山伦敦蒙难》《杨根思》《送传单》和《新结识的伙伴》等作品；他的画风多变，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经过多年苦心钻研中国传统线描技法，尤其是临摹陈老莲的线条，使贺友直豁然开朗，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62年，贺友直创作出艺术性较高并独具风貌的连环画作品《山乡巨变》，此书出版后，立刻获得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山乡巨变》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

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山乡巨变》获得绘画一等奖。

可惜的是，贺友直的连环画《山乡巨变》获奖不久，“文革”就开始了，直到1972年他才调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恢复工作。这期间，他有长达8年的时间没能拿起心爱的画笔。再画时，他甚至生疏到不会运笔了。这之后不久，他接到出版社的两个突击任务，画了《朝阳沟》和《十五贯》。这原本是两个戏曲影片，一个是昆曲，一个是豫剧。

为了画好这两部作品，贺友直到河南林县红旗渠体验生活。《十五贯》和《朝阳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成了他的代表作。

贺友直说：“我对我的学生讲，我是1937届毕业的。他们都奇怪，我告诉他们，我是1937年小学毕业，他们都笑了。”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贺友直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曾摸着上海美专的栏杆心想，要能进这里去学习该多好啊。如今，贺友直已经站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他一生感到最为自豪的时刻。

### 三

贺友直在画《山乡巨变》时，构思及草稿曾经被推翻过两次。他开始用的黑白明暗的方法，画面效果偏暗。贺友直觉得，这样的画风与脚本

提到的湖南资江边清秀明丽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不协调，于是反复修改。连环画《山乡巨变》的这套画稿，贺友直整整画了3年。

在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中，人物场景不多，动感的场面也不多，这给连环画的创作带来相当的困难。贺友直以一位优秀导演的眼光调度场景，将多角度、中远景交替使用，加上人物刻画细腻，使画面充满动感和变化，让读者能够饶有兴趣地看下去。最受大家赞誉的一段情节表现在第3册的第5幅到第20幅。这段文字表现“亭面糊”到富农龚子元家，动员龚子元入社，而社会阅历丰富的龚子元不但不答应，反而利用“亭面糊”好喝酒的弱点，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些消息。大段的文字描写与对白，场景只有一个，即龚子元家。贺友直在同一个场景中，利用人物的动作和人物上的表情变化，着意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场景虽不变，角度有调动，贺友直独具匠心，妥帖安排。表现“亭面糊”喝高了，场景似乎也跟着晕眩起来；到第20幅，从场景的角度看，“亭面糊”已经彻底醉了。

贺友直的创作，主要是在人物刻画上用心下功夫，而且注意环境背景的真实，并与之相配。贺友直认为：作为连环画家，一定要学会当导演，学会“做戏”。一段普通的情节，经贺友直的揣摩，抓住了人物性格特征，挖掘出人物内心活动，通过画面，能够巧妙地、最



▲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画中多用全景叙事，人物动态收敛又不失变化，刻画得惟妙惟肖，是典型的中国式白描风格。

大限度地向读者传达故事的内涵与精神。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吴兆修评价贺友直，说他是“会做戏的连环画家”，这样的一句话概括了贺友直与一般连环画作者的不同之处。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油画家、国画家都参与到连环画的创作中来，他们的画技没问题，但对连环画的理解往往不如贺友直。贺友直擅长用画面创造情节，描绘细节。他曾说，一画起连环画就觉得自己聪明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有生活基础，贺友直创作农村题材得心应手。他会“做戏”，譬如在连环画《李双双》中表现李双双和喜旺闹别扭后又和好，为了交代这个情节，贺友直设计了几个细节。喜旺跟双双闹矛盾，离家一个多月后回来了，觉得内疚，对不起老婆，于是在院子里劈柴，希望老婆原谅自己。双双回来后，看到这情景，知道喜旺是在认错。双双有一句道白：“家不会开除你。”画面上，李双双让小孩将家门钥匙递给喜旺。这一个动作，说明了李双双的内心世界，生动传神！

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十五贯》，更有典型意义。我们知道，著名连环画家王弘力曾画过同名连环画，而且在连环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笔者被王弘力刻画的娄阿鼠、尤葫芦所吸引，认为尤葫芦酒后的醉态、娄阿鼠刁钻的形象，就该长得这个样子。再次表现同一个选题，一般画家会觉得压力很大，不愿意去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这套稿子安排贺友直去画，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贺友直经过长时间的探讨，最后明确了创作方向：不把该故事作为悲剧处理，而是强调凡事都要调查研究，然后才能下结论。

《十五贯》的开头是这样的：尤葫芦是开肉铺的，平常嗜酒贪杯。在贺友直的笔下，尤葫芦大肚子且笨拙，扑在肉案上挥扇轰赶围着猪头的苍蝇；苍蝇多，喻示着猪头已经不新鲜了，间接反映尤葫芦的生意并不好。另一边是托盘端酒的养女苏戍娟，两个人物一起出场。王弘力的《十五贯》较为写实，而贺友直的《十五

贯》反其道，采用幽默夸张的风格，简洁生动，轻松诙谐，创造了另一种新的氛围。

贺友直不仅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连环画，而且善于总结经验。他从《山乡巨变》的创作中悟出三句话：“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他认为这三句话不能割裂开来，并认为一个画家毕生追求的只有“发现”和“区别”。有发现，才有创作对象；走自己这条路，才能跟别人区别开来。

### 四

1963年，为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原文化部调我父亲林楷与上海的贺友直、刘且宅共同绘制大型水墨组画《曹雪芹传》12幅，参加该活动展览。这是他们首次合作，画家们同住、同吃、同创作，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几乎每次到上海，我都要到贺友直先生家探访。小心翼翼地沿着逼仄的木楼梯踏上去，那里便是他的家。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一直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这是30平方米的居室，原是“过街楼”（上海搭在弄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5年贺友直搬进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在房间里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工作室，放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柜，还有满处的书，几乎就没有地方了。

## 人生 撷英

小时候写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去问爷爷。爷爷总是说：“自己思考了吗？”我说思考了但还是不会，爷爷便放下手上的事情，耐心地给我讲解起来。不论数学、物理，还是语文、历史，爷爷都讲得那么透彻，令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情不自禁地大喊：“爷爷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有时候，奶奶也附和：“那当然了！你爷爷也是奶奶的老师哦。”有一次，爷爷笑呵呵地回应：“不能这么说呀，这个‘最’字用起来要小心。爷爷也有学生不满意，要求换老师的。”我有点不以为然，心想，谁会这么没眼力见儿啊？

我的爷爷严济慈是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

我的奶奶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的一个女生。1920年，奶奶从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而在北京还不到一年，东南大学成立了，奶奶又回到南京，准备投考东南大学。为了备考，奶奶找到当时已入东南大学，且在校外业余讲课小有名气的爷爷为自己补习数学。奶奶说，爷爷特别聪明，从他解题就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尽管爷爷的东阳口音很重，但是他的讲解特别有条理，不管多难的问题、多抽象的公式，他都能讲得通俗易懂，让人很好理解。在爷爷的指导下，奶奶顺利考入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大学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女生，由此也爱上了这个补课的老师，跨越门第之见，成就了一桩姻缘佳话。

毫无疑问，在奶奶眼里，爷爷是个好老师，我也认为爷爷是个好老师。那么，怎么还会有人不满意爷爷，还要换老师呢？还真不可思议！我不好直接问爷爷，这个疑问就一直留在心里。直到前不久，我参加中国科学院大学纪念严济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活动，看到萨苏先生写的《严济慈遭遇“下课”风波》（《中国科学报》，2014年04月04日第11版），才解开了心中长久的谜团。原来，我爷爷遭遇“下课”还不止一回呢，有趣得很。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正式成立。我爷爷和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批著名科学家都兼任教师，亲自授课。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13个系，爷爷给8个系500多名学生讲力学和物理。每周3堂课，每堂课2个小时，共6小时。爷爷的物理课竟然能上得像文学讲座一般，在礼堂开讲。来听课的人达六七百之多，除了科大的学生外，附近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也都来“蹭课”。可见，爷爷的课是很受欢迎的。

当然，也有学生不满。开学不久，有学生陆续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物理学家施汝为先生反映说严济慈的课听不懂，要求换老师。施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听着，不置可否。然后他把有意见的学生召集起来，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学生们将信将疑。

一个月后，施先生再问那些学生，要不要换老师。大家都说，严先生课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先前反映爷爷的课讲得不好，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爷爷的东阳口音很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第二，爷爷讲课不按教材顺序，有时从中间讲起，有时从末尾讲起，“不按牌理出牌”。施先生认为，严先生的特点是知识渊博，能够融会贯通，挥洒自如。无论从哪里开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所以，学生们只要肯认真听一段时间的课，适应了老师的口音，对他上课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原来，施先生早已了然于心，胸有成竹。那么，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严济慈遭遇“下课”风波》一文“揭秘”道：“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汝为当年在西南联大也是听严先生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当时有个叫杨振宁的学生带着他们找学稼提意见，也是要换老师，结果半个月以后他们便被严先生的课折服了，再也不好意思提此事。施汝为先生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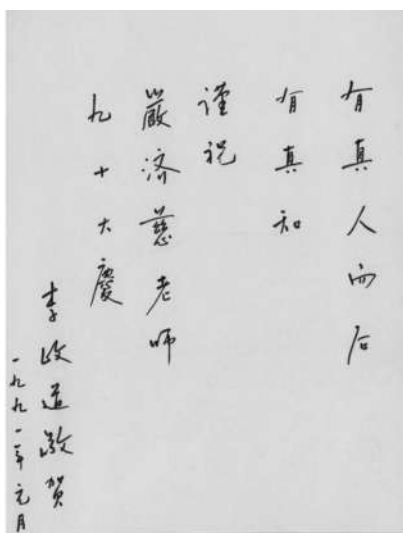
在生活中，爷爷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一走上讲台，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妙语连珠，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一位当年听过爷爷上课的中科院领导跟我说，每当爷爷上课，阶梯教室里总是满得没有座位，很多人只能站着听课。同学们为了抢到前排的好位置，都早早去占座，以至于几个系的班长不得不加以协调，排出一张座位表，



▲严济慈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上课

# 爷爷是个好老师

严慧英



▲李政道先生给严济慈的信，信中称呼严济慈为老师。

前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滚动轮换，“就像排球比赛的换位”，以示公平。

爷爷讲课自有一套路数。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总是启发学生联想。大家边听边思考，便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而爷爷越讲越来劲，似乎忘记了时间的存在。“拖堂”成了常态，以至于同学们想下课请教的时间都没有了。于是，爷爷就让大家把问题都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他，然后，他会一个一个地看这些问题，用书面形式，亲笔回复给每一个提出问题的学生。有时候，遇到一些推理、演算，他的回复往往写满两三张纸。那时科大的学生特别感动，都说没有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能亲笔回复。

1987年考入中科大，如今也是著名物理学家的潘建伟教授是爷爷的小老乡、小学弟。他很为自己跟严济慈同毕业于东阳中学而自豪。他说，爷爷影响了很多东阳学子，那种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东西”。多年来，东阳中学最好的学生很多都报考了中科大。潘建伟说，在中科大，每当爷爷要来讲课的时候，食堂就会多蒸馒头，因为大家都会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尽可能地多听课，多讨论问题。为避过了饭点吃不上饭，同学们就都买个馒头带着去听课。

爷爷有很多职务头衔和荣誉称号，我问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什么，他总是说“老师啊！”每当有曾经的科大学生来探访，爷爷总是特别高兴。他说：“科大的同学们，男生个个想成为爱因斯坦，女生个个想成为居里夫人，让我如何不爱他们！”

我的闺蜜，全国政协委员杨佳，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她说：“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物理学者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也是严济慈先生一手筹建的学校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看来，我小时候说的没有错，爷爷的确是个好老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